

臺東縣大武鄉公所

114 年度大武文化生態博物館共創計畫

人物訪查及完備資料圖文紀錄



人物訪查及完備資料圖文記錄

目 錄

1. 王秀春.....	1
2. 王璽盛.....	3
3. 朱美玉.....	5
4. 何良德.....	7
5. 吳阿雲.....	9
6. 呂坤山.....	11
7. 李政倉.....	13
8. 阮秀鳳.....	15
9. 阮茂榮.....	17
10. 林士中.....	19
11. 林秀英.....	21
12. 林春桃.....	23
13. 邱創義.....	25
14. 徐慶東.....	27
15. 高吳春昧.....	29
16. 高金美.....	31
17. 高德昆.....	33
18. 張來正.....	35
19. 莊春梅.....	37
20. 許芷禎.....	39
21. 陳志明.....	41
22. 陳宗欽.....	43
23. 陳定榮.....	45
24. 陳東茂.....	47
25. 陳絹宜.....	49
26. 陳慶榮.....	51
27. 彭建銘.....	53
28. 黃月葉.....	55
29. 黃萬吉.....	57
30. 葉少雲.....	59
31. 董炎輝.....	61
32. 廖紹安.....	63
33. 趙世崇.....	65
34. 劉明木.....	67
35. 劉貴雀.....	69
36. 蘇振村.....	71

1. 王秀春



民國 59 年，我嫁來台東富山，落腳於大竹。一家八個兄弟姊妹，熱鬧得很，婚後一個月，我們接手了家裡的生意在這之前，先生做過很多活：上山找香茅、種柳丁、梨子、木耳和香菇，搬來這裡後，轉為養鹿、養羊，也養豬，從前的豬不像現在，得靠配種，他還得牽著「豬哥」四處去配，非常打拼。

早年找香茅時曾發生意外，火爐爆炸，先生被炸飛摔傷了腰，五、六十年前醫術不發達，傷痛一直跟著他，到了 2017 年，他腰部與腎臟劇痛，一年內開了四次刀，後來因細菌感染過世，從此，剩下我一人。我把生意收起來，專心去學校教特教生，以前公公是警察，調動頻繁，去過綠島、濱南和台東各地，始終沒有定居，直到孩子一個個要讀書，我們才在大竹富山定下來，開了間「太城號」雜貨店。

我嫁來那年，公路局剛蓋好，金馬號、國光號開始通行，兩旁漸漸擺起麵攤、茶葉蛋和煎包攤位，很是熱鬧，到了民國 80 年 12 月 16 日，鐵路通車，一節車廂載 50 人，十幾節就是幾百人，但不過四、五年光景，到了民國 85 年後，公路局營運不下去，生意也跟著淡了，從前林務興盛，山上砍柴的人多，生意好做；後來柴砍光了，人也少了，想起以前跟先生、小叔上山，雨來了就隨手遮一遮，帶的只有米、鹽和魚罐頭，有什麼吃什麼，做「寮山」非常辛苦，工人坐在堆得高高的柴堆上，卡車一路顛簸，非常危險。

我常想，人要靠自己打拼，如果總等著別人救濟，是沒辦法生活的，現在

政府照顧多，補助也多，但有人因此不再願意工作，我們這輩人比較憨直，總覺得有工作就認真做，有菜有飯也能分人一些。

如今，先生走了，公公婆婆也不在了，回頭算算，我報戶口晚報了一年，實際也七八十歲了，繁華起落我都見過，從前整路熱鬧，現在大武沒剩幾個人，年輕人外出，老人家若沒子女寄錢，只能自生自滅，還好現在有關懷訪視，每個月送物資給獨居老人，我也參與其中。

時代落差很大，但我每天告訴自己：要心裡快樂，要記得笑。不然，日子要怎麼過呢？我感恩所有歷練，感恩帶領過我的人，沒有他們，就沒有今天什麼都敢學、敢做的我。

2. 王璽盛



今年 47 歲，家住在台東大武的南興村，我想說說我所知道的大武，這片從小生長的土地。

記憶中的大武，人很多，很有生氣，我幼稚園和國小低年級在尚武就讀，後來轉到大武國小那時校址還在現在永久屋的地方，當時一個年級有兩班，大約八十人，這還不包括大鳥、尚武的同學，如今看到的人口，和三十年前相比，確實少了許多，那時的路不好走，還沒截彎取直，我常從南興村騎腳踏車到大武上學，有時也坐客運，小時候的南興村，孩子非常多，在沒有網咖、手機和電動玩具的年代，每晚所有孩子都會聚在一起，玩著各種遊戲，村子非常熱鬧，如今人口外流嚴重，孩子少了，隔代教養也成了問題，氣氛安靜許多。

南興村是個排灣族村落，屬於東排灣體系，但建村歷史不長，大約八十幾年，我們的祖先從屏東獅子鄉草埔遷移過來，融合了南排灣與東排灣的文化，村子的原住民名字叫「路加卡斯」，意思是「很多九芎樹的地方」，當時的頭目發現這裡九芎樹茂盛，適合製作木炭與木材，便帶領族人在此落地生根，透過聯姻，也與屏東草埔的族人更加緊密。

南興村靠海，擁有長長的海灘，因此形成了多元族群的特色，除了原住民，還有早期遷徙而來的外省人、閩南人與客家人，大家共同生活在這個沙灘旁的村落，漢人多以捕魚為生，住在靠海處；排灣族人則較多從事山產與林木工作，共同構成了村子的生活樣貌。

南興村是大武鄉人口最少、面積最小的村落，位置偏南，靠近達仁鄉的安朔村，我印象中的南興村曾涉及近千人，如今只剩下不足六百人，實際常住人口可能僅兩百多人，這種人口外移的衝擊，非常明顯。

所以，為什麼我們願意回來？就是想改變這種情況，這幾年，陸續有年輕人返鄉，開餐廳或將在外學到的技能帶回家鄉發展，我也在約七年前，選擇在體力和薪資條件都還不錯的時候回到家鄉，透過宗教與社區的力量，我們想告訴大家：南興村是個單純、善良，值得回來付出與生活的地方。

回來這些年，我從為自己的村莊努力，到現在持續為整個家鄉付出，只希望趁還有力量與動力的時候，讓這片成長的土地，變得更好，回家，是為了讓故鄉的明天，依然充滿希望與溫暖。

3. 朱美玉



我出生在南興村，民國 46 年，父親來自曹埔，母親是大鳥人，他們在此相遇，我是家裡六個孩子中的老二。

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年代，我們沒有鞋子穿，衣服破了補、補了又穿，為了生活，全家搬到山上，種什麼就吃什麼，養豬養雞，勉強度日。

我讀的是當地的小學，那是學校的第四屆學生，但沒多久學校就廢校了，我們併去尚武國小，讀書的路時斷時續。

生活的重擔壓垮了父母，他們離異後，年輕的父親難以獨自撫養六個孩子，那時工資微薄，我們經常有一餐沒一餐，最苦的時候，我們去別人的山上討地瓜，配著蝸牛煮來吃，就這樣長大。

轉機出現在國小三四級時，許多平地人來海邊抓魚苗，有些人喜歡上這裡，便買地定居，我們開始與他們一起生活，他們捕魚，我們去海邊幫忙提網，他們就會分給我們一點魚，那是我童年最快樂的時光—能吃到魚，哪怕只有一兩條，都像過節一樣。

後來，教會來到了村莊，父母開始上教會，我們的生活與心靈都找到了依靠，在教會的教導下，生活觀念逐漸改善，品格也得到培養，但為了照顧弟弟妹妹，我小學畢業後就沒再升學，去給人家洗碗、打零工，我們六個孩子，就這樣彼此扶持，在貧困中堅韌地長大。

家中主食常常是地瓜、水煮香蕉和蝸牛，米對我們而言非常珍貴，能健全地活下來，我深深感謝父母後來的信仰，也感謝那份頑強的生命力。

為了改善生活，父親曾去壽卡的山上為林務局砍草，我們做兒女的，每隔一兩週就要爬陡峭的山路，用父親的工資換一點米背下山，也曾在山上種滿香茅草，割草、曬草、蒸油來賣，這都得看天吃飯，若連續下雨，油萃不出來，就等於做了白工，那些歲月，每一步都踩著汗水與艱辛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都長大了，有些弟妹順利讀到大學，像我這樣早早就擔起家計的，也努力活了下來。

回望來時路，從吃蝸牛度日，到見證家鄉點亮新光，這一生很苦，但也充滿感謝，感謝每一段經歷，磨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強韌的生命力。

4. 何良德



我是何良德，退休兩年後，我回到南興本部落生活，過去擔任過青年團團長，現在依然在部落裡服務，我想講講我所認識的南興村，尤其是從耆老口中聽來，關於族人從上部落遷移到這裡的艱辛生活。

擔任團長時，長輩交代我要把文化與傳統生活智慧傳給年輕人，但我發現這之間有很大的代溝，我的想法是：我們要「記得」過去，但不必完全「重過」那種生活，畢竟許多方式已不符合現代，然而，老人家的一些智慧，至今依然實用，比如種植，他們會看時節、看露水，決定何時種小米或花生，我在台中種菜時，試著照他們的方式去做，結果產量很好，又比如打獵後，他們會把肉埋在茄苳樹下因為樹根吸水力強，地下比較陰涼，肉就不易腐壞，這些都是生活累積的智慧，科學未必能解釋，卻很實用。

所以，我常告訴年輕人：老人家交代的事，有用的我們傳承，暫時用不上的，我們先記住就好，南興是個多元的部落，村長曾有閩南人、外省人，也有原住民，不同族群帶來不同的領導風格與生活模式，我們也得學習適應，我當團長時，正值外省人當村長，許多傳統無從詢問，我們便嘗試融合都會與原鄉的元素，創造出屬於我們的「風靈祭」，活動辦得很熱鬧，也讓南興開始有了團結、認同與尊重的基礎。

正因經歷過這種層層的磨合與改變，南興才慢慢形成現在的樣子，我們有來自富山、草埔等不同家族，口音各異，性格也不同，像我母親草埔的語調柔

和，父親富山的語氣剛硬，但家族之間彼此認同，反而形成一種凝聚力，村裡的信仰也多元，有傳統信仰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早年閩南人甚至比原住民還多，同學裡也有外省、客家子弟，雖然族群多元，但相處逐漸融洽，就像豐年祭時，我們會主動邀請他們，分享小米酒與食物，彼此沒有隔閡，「路加卡斯」是我們部落的名字，意思是「九芎樹很多的地方」，過去河邊山邊都是九芎樹，後來有漁民、外省人因婚姻或工作遷入，客家醫生也來服務，漸漸形成這個多元共居的村落，如今，南興面臨的挑戰是人口外流、產業不足。土地大多荒廢，水源也有限，我很希望有專業單位能來輔導，告訴我們這片土地適合發展什麼，讓族人留在部落也有生計，作為一個曾經的青年團長，我始終相信：記得傳統，是為了更好地向前走，而接納多元，則是南興能夠團結向前的力量。

5. 吳阿雲



民國五十六年出生，來自屏東萬丹紅豆的故鄉，她的人生轉彎，源於姑丈的一個決定，當年姑丈到大武探訪，覺得這裡環境純樸、氣候宜人，便先行買下一棟房子，阿雲從小就跟著姑丈、姑媽生活，這棟房子一度無人居住，也成了她與大武結緣的起點。

二十出頭那年，阿雲與先生結婚，正值民國七十年代，姑丈給了他們一個選擇，也是一場考驗，搬到大武住上兩年，若能自給自足，便留下來，若不行就回屏東，年輕的她沒有退路，也沒有猶豫，帶著一股「試試看」的勇氣，和先生一起南下，正式落腳大武。

初到異鄉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活並不容易，台東的土黏、路遙遠，交通不便，回一趟屏東或高雄，只能騎機車。即使懷孕、肚子漸大，也仍坐在機車後座奔波，一次不慎摔車，流了血，幸好孩子平安，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，那個年代的大武，街上店家不多，繁華集中在外環道過橋一帶，大武街本身只有零星雜貨店，生活機能有限。

阿雲在大武經營「金桔城香舖」，販售佛具與祭拜用品，年輕夫妻開金香店，在當時並不被看好，不少人投以懷疑的眼光，認為這是老人家的行業，但阿雲從十幾歲就因姑丈、姑媽而接觸這一行，對貨品、客人需求並不陌生，她堅持貨源齊全，若客人有需要，即使成本較高、必須遠程寄送，也盡力幫忙張羅。

兩年期限屆滿，她不但站穩腳步，也證明了自己，姑丈隨後要求她正式把房子買下，避免日後產生糾紛，並在創業初期給予資金與貨源上的全力支持，這份情，阿雲始終放在心裡。

一轉眼，三十六年過去，左鄰右舍從陌生到熟識，許多長輩已相繼離世，但情感卻留在街道裡，如今的大武雖不若往日熱鬧，阿雲仍期盼年輕人能回鄉服務，讓地方的生活與產業得以延續，她相信，只要有人願意留下，這片土地的故事，就不會中斷。

6. 呂坤山



在這裡生活已六七十年，小時候，我跟著父親做林班，那時候的林木工作，全是人力，砍柴用手鋸，搬運靠「木牛」滾木，連開路都得用人工硬開，遇到大石擋道，得慢慢打鑿清理，不像現在有怪手、堆土機，山上一窩窩燒木炭，木柴得靠「木馬」運下山——那得要懂技巧，否則控制不住，非常危險。

後來林班禁止伐木，我跟父親改種檳榔青，那時檳榔青好賺，但沒幾年行情轉差，我便轉行開砂石車，其實早在開車之前，我也抓過魚，早年用竹排，人力扛灘，後來才有了小推進機，尚武這裡曾有大陳義胞定居，政府為他們建港、蓋房，但港口終未建成，許多人也就散了。

我見證過大武的繁華，台汽客運金馬號時代，大武終站人山人海，旅社、戲院、商店生意正好，當時山產豐富，鳳梨、香菇供不應求，抓一隻白面鼯鼠能賣好幾千元，對三十多年前來說是很好的收入。

但鐵路通車後，一切都變了，大家改坐火車，公路局漸漸沒落，大武也隨之蕭條，土地不易耕種，人口外流，往日的熱鬧只剩回憶，以前這裡有兩間戲院，我們也經營過一陣，直到閉路電視普及，電影院也就一間間關了。

我年輕時為了生活，什麼都做過：抓魚苗、抓蝴蝶、溪裡找蝦，深入加羅阪溪、大武溪那些幾乎無路的山林，也曾走進39、40林班，那時有人在山裡迷途失足，時代艱難，生死往往一線之間。

如今林班不再，大武靜了下來，那些靠山吃山、與自然拚搏的歲月，那些汗水與生機交織的日子，都隨著時代改變，留在了記憶深處，我走過的路、看過的變遷，就像山裡的迴響，輕輕說著：這裡曾經很熱鬧，這裡的人，曾經很努力地生活過。

7. 李政倉



自小並非在福安宮一帶長大，而是生活在復興路，與福安宮、與李王信仰的結緣，起初並非出於宗教熱情，而是一段因書寫而展開的旅程，多年以前，她與學長一同編寫社區報，因報導題材的需要，開始接觸福安宮的歷史，也逐步走近李王的故事。

對李王產生共鳴，其實也與家族信仰有關，她家中供奉的神明正是李福清千歲，王爺信仰在祖父輩的年代相當興盛，長輩認為家中也該供奉神明，而「同姓同源」的李王，便自然成為守護家族的存在，從小在香火與祭儀中成長，卻直到書寫社區報時，她才第一次試著用歷史與田野的角度，重新理解這尊陪伴自己長大的神像。

隨著訪談耆老、蒐集資料，她逐漸發現李王的歷史遠比想像中悠久，地方耆老回憶，早在童年時期便已見過這尊神像，外貌至今未曾改變，若依此推算，李王的存在至少超過百年，甚至更早，耆老們口中流傳的故事，也牽引出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—皇民化運動期間，地方廟宇遭遇毀廟、毀神的衝擊，福安宮亦未能倖免。

傳說中，當年福安宮內多尊神像遭到破壞，唯有李王被悄悄保存下來，地方耆老的親族在統治家族中幫傭，危急之際，將李王神像藏於屋內，直到光復後才重新迎回，這段往事，也解釋了廟中至今仍保留的一顆石頭，那是土地公神像被毀後，暫時作為信仰寄託的象徵。

故事尚未止於此，還有關於戰爭時期轟炸的傳說：砲彈落在藏匿神像的屋旁卻未爆炸，被視為王爺庇佑的象徵，這些真假難辨的敘述，交織出濃厚的信仰色彩，也顯示王爺信仰在地方生活中的深厚根基。

面對這些故事，李玫倉與夥伴始終保持謹慎，她明白，社區書寫必須在信仰、史實與長輩認知之間取得平衡，有些內容即使可考，仍不一定適合完整公開，完成社區報的那一刻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，從童年仰望神像，到親手整理其故事，她也因此與福安宮建立了更深的情感連結。

後來，福安宮啟程前往南鯤鯓進香，她也為家中李王擲筊請示，親自開車載著王爺同行，完成一趟象徵「回鄉團聚」的旅程，那不僅是一個信仰的回應，更是她與地方、與歷史之間，靜靜完成的一個心願。

8. 阮秀鳳



回憶起早年的大武，總說那是一個「什麼都有」的地方，草埔的人、金崙的人，甚至更遠地方的居民，只要買東西、要辦事，就一定會往大武來，豬肉、雜貨、麵食，全都集中在廟的後方，天還沒亮，街道就已經開始熱鬧起來。

清晨四、五點，大武便醒了，菜市場在廟後面，人潮一早就聚集，等著買菜、買肉，那時候車站附近反而沒什麼店，真正熱鬧的地方都在街上，整條路人聲鼎沸，百貨店、麵攤一間接一間，連草埔的外省人都特地來這裡剪頭髮，大家都說：「大武什麼都有。」

她記得，大武的女孩子多半自己煮鴨蛋，端到街上賣，那個年代沒什麼消費娛樂，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吃，每一班車來，旅客幾乎都會買東西，鴨蛋、包子、煎包，一下子就賣光，生意好得很，整個街道都是忙碌的身影。

還有一些現在已經看不到的景象，有人賣蛇、賣松鼠，甚至賣玉蘭花、賣猴子，都市來的客人一下車，全都圍過去看，因為那些東西在城市裡根本見不到，松鼠、野味成了旅途中的奇景，也成了那個年代大武街頭的記憶。

那時候大家不說搭公路局，都是說「坐巴士」，要去台東、去高雄，都是坐巴士，但路況不好，全是石頭路，顛簸得厲害，整車的人常常一路吐到下車，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，可那就是當年的日常。

夜裡，大武依然不安靜，抓魚苗的、做「寮仔山」的工人，晚上會聚在她們的店裡等車，冬天寒風刺骨，他們拜託不要太早關門，說外面太冷，她們心軟，常常一路做到凌晨一、兩點，明明自己也累得想睡，還是撐著。

她原本離開家鄉工作，後來父親過世，才又回到大武，店旁邊是郵局，對面是趙老師開的飯店，在當時算是非常氣派，附近有人賣水果、賣糖、賣蜜餞，芭樂用鹽巴醃著賣，旅客暈車下來，一定先買蜜餞壓胃。

那是一個大家早起、認真做事的年代，六、七點就開門，從早忙到晚，吃飯還得輪流。雖然辛苦，但生意興隆、人情濃厚，後來時代變了，她也再度離開，只是那些熱鬧滾滾的畫面，始終留在記憶裡，成為她心中最鮮明的大武。

9. 阮茂榮



我家和隔壁鄰居本是同家族，早年都住在一起，後來，那位鄰居在外賺了錢，他修車、收山產，甚至收蛇、收白鼻心，積攢了不少便回來找我父親商量，一起將老屋重修，從前他家矮窄，如今大家一起蓋，房子變得寬敞許多。

房子修好後，我父親本來沒打算做什麼生意，是一位沒工作的姨丈提議，說這屋子空間夠，不如開間撞球館，他願意幫忙顧店，就這樣，球館開張了。

沒想到，生意出奇地好，那時大武沒什麼娛樂場所，白天抓魚苗、開大卡車的人，晚上下山沒處去，就湧來打球，我當時還是孩子，印象中館裡從早到晚都是人，常營業到深夜，甚至半夜還用電瓶供電照明。

球館裡有兩種球台：一種是古式「日本球」，打四顆球，兩白兩紅；另一種是「斯洛克」，打四顆球是從英國傳到日本，再傳到台灣的，玩法有計點制，比如兩人對打，技術好的打 100 點，差一點的打 50 點，誰先打滿點數就贏，輸的付錢。

那時候的物價，一碗擔仔麵兩、三塊錢，一角錢還能買到東西，打球對當時的人來說，算是奢侈的娛樂，捨得花錢的，多是收入較穩的司機或工人，我記得一位台南來的大卡車司機，每次經過都會來打上一兩鐘頭。

因為開球館，我從小練球，打得不錯，在大武，我和阿義被說是打四顆球和斯洛克的一流好手。

如今回想，那雖是個物質不寬裕的年代，大家卻好像過得比較快樂、自然，白天辛苦工作，晚上聚在球館打球閒聊，生活有種簡單的趣味，現在娛樂看似更多，但像那樣聚集人氣、充滿聲響與溫度的場所，卻漸漸消失了，電影院沒了，球館也安靜了，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熱鬧而樸實的快樂，彷彿也跟著熄了燈。

10. 林士中



二十三歲那年，開始開著麵包車走遍南迴，原本學做麵包的他，在知本起家，眼看當地麵包店愈來愈多，便與太太商量，嘗試以麵包車走進不同聚落，受到台中麵包車模式的啟發，他們決定把麵包送到人們工作的地方，讓生意自己去找人。

最初的路線從知本一路往南，穿過各個營區與聚落，當時沿線海防哨密集，阿兵哥人數眾多，長官允許他們進營區販售，卻不希望士兵外出購買，於是林士中每天在各營區之間穿梭，最後來到大武，那是三、四十年前的大武，南迴鐵路尚未開通，所有人都必須在此停留吃飯、消費，大武街人潮洶湧、商家林立，是名副其實的中繼重鎮。

他們曾在大溪落腳七年，因房價便宜先買了房子，生意仍持續沿線跑動，直到南迴鐵路與工程逐漸完工，公路客運人潮驟減，地方景象也開始轉變，林士中熟悉原住民部落的生活節奏，白天在平地，晚上再進山區，因為族人多半外出工作，傍晚返家後才是最熱鬧的時候，那時工作機會多，年輕人與長輩都還留在家鄉，山區夜晚總是燈火通明。

隨著工程結束、產業外移，工作機會消失，人口也快速流失，林士中於是選擇在大武定下來，為鄉親服務，麵包車雖是小本生意，但他看見不少家庭因父母外出工作，孩子常常放學後沒東西吃，便在跑山區時分送些麵包給孩子們，那是福利制度尚未健全的年代，這些微小的付出，卻成了孩子們溫飽的一

部分。

來到大武將近三十年，他親眼見證街道由繁華轉為冷清，年輕人外流，只剩長輩留守，老街空屋愈來愈多，過去沒有一間空房的大武街，如今九成以上是老人家居住，交通型態的改變、公路客運站的拆除，讓曾經的精華地段只剩下記憶。

然而，林士中仍對大武抱持期待，他認為這裡的人情純樸、少有算計，是難得的優點，近年也看到一些中生代與年輕世代，願意返鄉嘗試地方創生、社區行銷，重新點燃地方活力，他期盼，有一天大武能再次成為讓人願意停留、生活、工作的地方，讓年輕人不必離鄉背井，也能在家鄉自立生活，這，是他對大武最真切的心願。

11. 林秀英



約兩歲時隨家人搬到古庄，在這裡一住就是 62 年，關於古庄的歷史，我多是從耆老口中聽來的。

根據長輩的說法，我們是在民國 35 年至 37 年間，從新化部落（舊稱「古巴侖」）遷徙至此，帶領我們的精神領袖與頭目，是黃明德先生，他當年認為，族人住在偏遠山區，無論是讀書或生活都與外界隔閡，若能遷至平地與漢人交流學習，部落才可能進步，於是，他率先探勘，隨後帶著一批族人來到此地，古庄部落就這樣慢慢成形。

古庄舊名其實叫「木樽」，是牧場的意思，我父親年輕時就在這裡幫人放牛，老一輩的大武人都知道這個舊稱，至於為何後來改叫「古庄」，至今無人能說清，成了我們仍在摸索的謎。

小時候，這裡還沒有金龍橋，也沒有現在的道路，我們去尚武國小讀書，無論晴雨，都得徒步走過河床，遇到大雨或颱風，根本無法上學，後來政府建了橋、開了路，大家有了摩托車、汽車，生活才漸漸便利。

我對尚武的繁華記憶很深，國中時，我們搭金馬號交通車去上學，假日路上滿是穿著筆挺軍服的海、陸、空軍人，紀律嚴整，景象熱鬧，尚武曾有過戲院，我們常去看電影，更早時，部落主要以種香蕉維生，後來改種香茅，我還記得煮香茅的爐子，將油與水分離，過程非常辛苦，香茅之後，人們開始種香

菇，接著工業起飛，不少族人便外出謀生。

這些年來，古庄的建築從木造瓦房變成水泥樓房，但戶數增長不多，部落仍以排灣族為主，靜靜座落在山與海之間，關於「古庄」名稱的由來，我問過許多長輩，始終沒有答案，但我知道，這裡承載著一代人從山上到平地的遷徙故事，也收藏著我們走過河流上學、在香茅煙霧中勞動的集體記憶，這些或許才是名字背後，真正活過的痕跡。

12. 林春桃



民國 68 年（1979 年）認識先生後，便嫁到這山區小鎮，那時先生正在從事林班工作也就是伐木業，我起初不會做這行，只是跟著他上山玩耍，後來漸漸學會幫忙，從煮飯開始，一步步融入這份辛苦的山林生活。

林班工作大多在深山進行，一去就是好幾個月，我們住在山上的工寮宿舍，那裡雖有簡單商店，卻遠離塵世，每週我會騎機車下山一次，買米、買菜，再趕回山上，孩子們也在這環境中長大，我經常帶著他們上山，一邊煮飯一邊照顧。

那年代的林班全靠人工，沒有怪手也沒有吊車，樹木鋸成一段段後，我們用扛的、滾的，將木材運下山坡，卡車來時，大家合力用木板搭橋，一根根扛上車鬥，疊得滿滿當當才載出去，先生和十幾名工人常常忙到深夜一兩點，才把車送到安全大路才放心回家，若遇壞天氣，山路濕滑，車子容易傾斜甚至翻覆，掉進崖下就危及性命，有時車翻了，還得重新拉起車身、再疊木材，辛苦可想而知。

我負責煮飯，常為二十多人準備餐食，用柴火燒飯燒水，連工人洗澡的熱水也一併燒好，山上沒冰箱，肉魚兩三天就得補買，我們一家靠這行維生，從先生獨自做起，到我加入，再帶孩子上山，做了好幾十年。孩子們從小耳濡目染，老大六歲左右就跟我們上山，最小的女兒出生於 82 年，直到她高中畢業後，我們才結束林班生活，轉而種蘭花或其他山上營生。

當時當地工作機會少，許多人有家室的都去做林班，賺錢養家，外地工人更辛苦，數週甚至數十天才下山一次，住旅社、吃麵攤、喝酒放鬆，或買生活用品再搭大卡車回山，山路狹窄坎坷，專人保養仍難免坑洞，林班一區做完，按噸位或面積結帳，再換下一區，生活就在移動中度過。

回想那段日子，雖然艱辛，卻是我們一家靠山吃山的真實寫照，先生雖非原住民，卻特別擅長山林鑽營，從不迷路，也從不讓我們走失，如今機械化了，一切方便許多，但那份純粹的人力歲月，永遠刻在記憶裡。

13. 邱創義



今年 73 歲，生長在大武這塊土地，從小到大見證了這裡的興衰變遷，大武依山傍海，過去居民多以農業和捕魚維生，吸引許多人聚集於此，形成了熱鬧的聚落。

我小時候，大武老街是整個鎮的中心，當時沒有外環道，所有車輛都從老街經過，人車川流不息，熱鬧非凡，大武國小就在附近，舊車站也設在老街中段，周圍住戶密集，街上有露天戲院，雖由外地人經營，沒撐多久就關了，後來台汽客運站遷到復興路那邊，又開了一間室內電影院，經營了很長時間，那個年代，孩子們大多留在家鄉，人口集中，老街自然繁榮。

大武的興盛，還來自林班事業，林務局在漢華設有林班，大量外地工人進出，他們上山前或下山後，常在大武老街落腳，老街因此開了五六間以上的旅社，專門接待這些工人，帶動了人潮與商機，此外，每年魚苗季節，屏東魚塢的老闆和工人會來這裡抓魚苗，我小時候常聽到他們數魚苗的聲音：「一尾過兩尾，兩尾加三尾……」，感覺既新奇又熱鬧，出海捕魚的人則用罾網撈丁香魚，捕獲量大，曬乾後外銷，也是重要收入。

山上居民多種植香茅，這裡土壤貧瘠，不適合一般作物，卻正好適合香茅生長，那時整座山幾乎都種滿香茅，提煉香茅油外銷，需求量大，成為許多家庭的生計來源，後山金龍湖附近有大片水田，種稻的人將稻穀賣給碾米廠，換取白米維生。

我們家在老街做生意，賣豬肉、賣菜，還經營雜貨，因為林班工人、外地抓魚苗的人、捕魚人家人口多，每天生活所需量大，生意特別好，從大武到尚武這一帶，賣菜賣肉的店家不少，人潮帶來財潮，我們兄弟倆也跟著父母一起幫忙，日子過得充實，然而，隨著時代變遷，大武老街逐漸沒落，年輕人對農漁業失去興趣，紛紛離鄉到外地工作，舊車站和大武國小遷到復興路一帶，新建築如十八間房舍陸續興建，生意人也跟著搬過去，老街人氣漸散，南迴鐵路通車後，更是雪上加霜，人們改搭火車，公路客運衰退，老街的車流銳減，偏偏火車站設在山腳，無法帶動莊內人潮，反而讓過去公路時代的榮景顯得更珍貴。

如今回想，那段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的日子，雖然辛苦，卻充滿活力，大武老街的熱鬧，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
14. 徐慶東



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，大武正經歷它的黃金年代人稱「南迴驛站」的繁華歲月。

那時的大武雖小，卻非常豐富。這裡族群多元，有漢人、閩南人、原住民，甚至有不少從西部「跑路」過來的人，彼此融合，風氣純樸。

後來我在一場展覽中分享過一個比喻：作家七等生寫過一篇《白馬》，說若有白馬奔過一個村莊，那裡就會變得豐饒興旺，而大武，確實迎來了一匹「白馬」-公路局。

公路局車站設在如今郵局旁，徹底改變了大武，那時道路多是砂石路，從台東坐車到大武就得三、四個小時，塵土飛揚、顛簸難受。因此，每當金馬號播報「到大武站休息三十分鐘」，乘客便紛紛下車，第一件事就是衝向路邊水溝嘔吐。

吐完之後，面對接下來四、五小時車程，人們得趕緊吃點熱食、買暈車藥。於是，大武街邊的麵店、排骨飯店、土產店一一開張，許多山產店門口更直接掛上「專售暈車藥」，短短一條街，還開出四、五家旅社，有的甚至附設「戶查士」，可見當時娛樂需求之盛。

除了旅客，林班工人週末下山消費，也帶來人潮與錢潮，連西部來的大貨車，也常在此停靠，用水澆灌過熱的輪胎，順便吃飯休息，這些流動的人與

車，撐起大武五十幾年直至六十年代初的興旺。

衰落，是從「十八間仔」出現開始的，原本繁華集中於福安宮一帶，後來對岸蓋了十八間房子，稱為「十八間仔」，逐漸吸走人氣，加上舊站腹地不足，公路局最終遷站，大武街便日益蕭條。

如今大武中午雖仍停滿大卡車，但昔日那匹帶來繁榮的「白馬」早已奔遠，我常覺得，大武似乎進入了一種停滯，交通曾是它的最大優勢，白馬跑過，村子便活絡；白馬離開，一切便沈寂下來，除非這裡能創造新的亮點，否則那段滾動著人聲、車聲與希望的黃金歲月，大概只能留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裡了。

15. 高吳春昧



民國 44 年（1955 年）3 月 13 日出生於南興村，今年剛好 70 歲，我是南興國小第一屆畢業生，之後就讀大武國中，再到台東女中，那是我的全部學歷。

我們南興部落的居民，大多是從富山（大竹村）遷移過來，祖先來到這裡時，這片土地長滿九芎樹和相思樹，原住民稱之為「魯加卡樹」，意思就是「那棵樹」，他們抵達後，便砍伐樹木，劃分土地，蓋起房子，開墾屬於自己的家園，舊部落位於西邊山面，新部落則逐漸形成於現在的位置，並非全村一次性遷移，而是陸續有人搬來，我們家原本住在舊部落最上方，那裡靠近水源，取水方便，又有山水可用，後來才因房屋失火燒毀，我們才搬到新部落。

搬來時，我已經出生，家中蓋的是茅草屋，直到火災後才在現在的位置重建，那時沒有自來水，大家靠山泉或打井抽水，生活極其簡樸，讀國中時，我們得騎單車或搭車到大武國中，路上會經過當時最繁榮的舊大武市區郵局一帶，那裡有公路局站，車水馬龍，麵店、小吃攤林立，像個熱鬧市集，偶爾想看電影，就搭一種無頂棚的三輪車，十幾個孩子擠在一輛車上，付點車資，便晃晃悠悠去 7-11 附近的戲院，那是我們少有的娛樂。

那個年代，大武的經濟支柱之一是香茅，山上適合種植香茅，香茅油外銷需求大，一時間人人爭相種植，我們家也靠這個維生，香茅草收割後，得曬乾，才能放進香茅爐蒸餾提煉成油，山上運輸全靠流籠沿著鐵線滑下，一捆捆香茅草從高處流到山下，再用車載到爐子旁，雖然辛苦，但收成快、現金馬上

到手，許多家庭，包括我們，都是靠香茅油的收入，才有錢供孩子讀書、改善生活，若沒有香茅，我們這一代恐怕連國中都讀不成，此外，新化一帶深山盛產香菇，也有人專門收購販售，帶動另一波經濟，那時舊大武街區人潮洶湧，我們家開雜貨店，生意興隆，每天都有林班工人、捕魚人、外地來的人光顧，日子過得充實，如今，一切都變了，公路局舊站遷走，南迴鐵路通車，新商圈轉移到另一邊，舊市區逐漸沒落，過年開車經過郵局前那片曾經繁華的街道，冷清得讓人感慨，南興這邊更安靜，山豬窟休閒區雖有天然美景，卻因道路不便，少有遊客，偶有民宿或小吃部開張，盼能留住過客，帶來一點收入，但多數年輕人都外移他鄉，村裡常只剩老人。

回想童年與少年時光，生活雖困苦，卻充滿人情味，那段靠香茅、靠山林、靠海維生的日子，成為我們這一代最深刻的記憶。

16. 高金美



加羅板部落，是在台灣光復後才逐漸形成的，民國 40 年之前，族人大多住在約十公里外的「老虎部落」，後來陸續遷移到 24 林、25 林一帶，中間也曾搬往南田、安朔，但因不適應又返回，最終才落腳於此。

這裡是過去往返大武的必經之路，早期物資缺乏，人們要走這條路去大武採買油、鹽、燈火等日常用品，因為途中需要休息，加上附近有些平地，幾戶人家便搭建草屋暫居，後來越來越多族人遷入，逐漸形成部落。

我們屬於大武鄉大武村，過去以務農為生，養牛、養豬、養雞，主食是芋頭和地瓜，部落有一點水田，種出的稻米大多拿去大武街的碾米廠換錢，那時生活不富裕，但大武街因為有公路局車站，頗為熱鬧，街上有來自雲林虎尾的廚師開了餐廳，對當時來說已是很難得。

生活中，溪裡有豐富的魚蝦毛蟹，自家養的雞也夠吃，唯獨豬肉比較珍貴，偶爾才去大武街上買，部落裡有兩處煮香茅草的竈寮，很多家庭靠提煉香茅油換取收入，後來也有人去林班砍草、扛木材，賺取日薪。

直到民國 80 年代左右，部落開始有人外出從事「綁鋼筋」的鐵工工作，日薪逐漸提高，生活才明顯改善，現在部落裡不少人因為做鐵工，經濟變得寬裕，也有能力在外買房、開好車。

回想三十多年前，日子確實比較辛苦，但卻單純許多，那時候溪裡毛蟹成

群，山產隨手可得，人與人之間緊密相依，現在生活好了，我反而懷念過去那種無憂無慮、知足簡單的日子，或許，真正讓人安心的不是富裕，而是那份與自然相伴、與族人共度的純粹時光吧。

17. 高德昆



民國 71 年（1982 年）11 月 17 日出生於屏東，在南興村部落長大，幼稚園到國小都在部落度過，國中後到臺東市區讀臺東體中，畢業後入伍從軍，服役 20 年，直到前年退休，才回到部落，開始投入部落發展與回饋，我這一代幾乎沒經歷過大武老街的輝煌，前輩們說的老街繁榮時期，舊車站、戲院、旅社林立，人潮洶湧，到我小時候已經轉移到臺七（台汽客運站）一帶，那裡才是我們眼中的「市中心」公車轉運站旁熱鬧非凡，下車乘客如採購團，路邊攤、桌攤、店面應有盡有，我們偶爾相約去湊熱鬧，跟著長輩擺攤，生意好時能討到糖果、餅乾或一點小費，像電影裡的大城市般新奇，部落離市區有段距離，那年代家家有車並不容易，我們很少機會參與那份繁榮，南興村屬第二發展區，平坦易居，但更早的舊部落和上部落還在山上，過去水源決定聚落位置，大家靠近河川或山泉，自來水普及後，才逐漸下移到平地。

我們這一代正好趕上部落下移的尾聲，童年仍在茅草屋時代，我還不小心玩火燒過鄰居房子，小時候娛樂簡單，卻充滿風險，玩火、玩水最容易闖禍——過馬路到河邊或海邊，回家一定是挨棍子，沒事可做時，就在農地邊抓蚱蜢、捉牛、觀鳥，與大自然融為一體，喜怒哀樂來得直接：玩得開心，兩巴掌或棍子隨之而來，生活單純，回憶卻格外深刻，如今我有四個孩子，時代完全不同。科技帶來便利，也帶來誘惑，手機、課綱、物質需求讓親子溝通變得疏遠，許多父母為了生活在外打拚，孩子交給老師或手機，家庭時間難得交集，

我退休後選擇回鄉，一方面想多陪家人，一方面希望為部落創造改變，部落就業機會少，生活開銷卻不低，年輕人不得不外流，但每逢過節，大家仍會回到這片土地，因為這裡是心靈的充電站與庇護所，我問自己：為什麼別人的鄉村能與城市並存，我們卻不行？在外打拚二十年，我見識過外面的發展，便想把經驗帶回來，哪怕只是小小一點，我希望孩子們將來若有合適工作，能留在家鄉，每天見面，若部落能提供基本家庭開銷的就業機會，誰願意遠走他鄉？如今中壯年外出賺錢，老少留守，形成無限循環，我回來，就是想打破這循環創造機會，讓下一代不必重蹈覆轍，即使難度很高，只要信念一致，總有人要開始。

退休這一代，也到了回饋的時候，我們接下老一輩的棒，負責上下連結與照顧。這是每個部落的傳承，我相信，人多人少不是關鍵，重要的是那份歸屬與行動。只要有人願意回來付出，部落就有希望繼續前行。

18. 張來正



原住民名字叫 Bia，我們這一帶，從前是由三個小部落組成的：彩泉、初屯和達萬，合稱為三角部落。

我出生於民國 38 年，在我小時候，經歷過部落遷徙的過程，日本時代，政府將原住民從舊部落遷移到山下，我們彩錢部落經歷了三次遷移，從最早的舊部落，到第二次、第三次遷徙，才逐漸安定下來。

遷移是陸陸續續進行的，彩泉部落的人先抵達，後來出屯和達旺的人才慢慢下來，各自開墾土地，定居生活，我是在部落遷移期間出生的，見證了這個聚落從無到有的過程。

說到我們大武鄉的農作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最適合種植的似乎還是小米、紅米和樹豆，這裡的土質似乎與太麻里、卑南等地不同，我們嘗試種過釋迦，但不太成功，可能是土質問題，也可能是缺乏專業的栽培指導。

民國 60 幾年後，我們開始大量種植香茅，生活因此有了明顯改變，但如今，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有農業專家能來大武鄉，為我們分析土質，指導適合種植的作物，這樣，年輕人才有機會留在家鄉發展，有更多的工作機會促使年輕人留下，而不是全都外出謀生。

你看北邊的鄉鎮，年輕人紛紛回鄉從事農業，種植南瓜、紅米等作物。我很羨慕，也希望大武鄉能有這樣的景象，除了農業，我們也靠海生活，但尚武

漁港目前的狀況，讓漁民作業非常艱辛，早年沒有港口時，漁夫在沙灘搶灘上岸，風險極大，曾發生過船難，非常可憐。

我真誠期盼政府能重視漁港建設，也盼望有農業專家前來指導，讓我們的土地與海洋都能成為生計的依靠，讓年輕人願意回來，一起提升家鄉的生活。

19. 莊春梅



莊春梅，土生土長的尚武人，除了求學時期，我從未離開過這裡，後來也在尚武國小教書直至退休，正因如此，我對家鄉這幾十年的變遷，感受特別深刻。

最讓我感慨的，是今昔的對比，五十年前的尚武非常繁華，光我們國小全盛時期就有近 750 名學生，如今，尚武和南興兩村的孩子加起來，國小部僅約 60 人，變化之大，令人唏噓。

尚武有個特殊之處，這裡是全台東僅有的三個「新村」之一，稱為「披星新村」，大家熟悉的天後宮，現在看到的已是重建後的樣貌，我總是堅持稱它為「大陳天後宮」，因為媽祖是隨著大陳鄉親，從大陳島請來的，耆老們說，當年遷台前曾擲筊請示，媽祖願意隨行，而他們離開的當晚，原鄉的天後宮便在雷鳴中被天火燒毀，這份淵源，讓「大陳」二字格外重要。

小時候，我常看到裹著三寸金蓮的大陳阿婆，清早提著拜籃，搖搖晃晃地穿過學校操場，沿山邊小徑去祭拜，那條路上有小廟，廟裡有張造型獨特、兩頭翹起的高腳拜桌，後來小廟不存，拜桌也消失了，我一直感到可惜，那些都是重要的文化記憶。

大陳島本身不產米，因此鄉親對米食格外珍惜，反而將米糕等米食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他們當年遷台時，幾乎什麼都沒能帶走，許多人是孑然一身來

到這片土地，從一無所有，到慢慢紮根，這份堅韌令我由衷佩服。

如今，兩岸開放已超過他們來台的七十年，族群也更加多元，作為一個在地長大、見證這段歷史的人，我始終覺得，這些故事與文物值得被記得，因為記得，我們才能理解腳下這塊土地，層疊交織的過往與人情。

20. 許芷禎



那時，店裡還兼著刻印章的生意，許芷禎常靜靜坐在一旁，看振村埋首於一方方木石之間，來刻章的人絡繹不絕，有的是為了公文往返，有的是為領一份薪水，也有滿懷期待開店立業的年輕人，每一顆印章送進來，都帶著一份託付，每取走一顆，就像完成一個家庭的儀式，她記得，那時的印章多是篆字，筆畫細緻如畫，轉折間藏著老手藝的從容，振村一坐就是大半天，燈下專注的背影，成了她記憶裡一道安穩的風景。

有時她也聽振村提起，某天一位尚武的阿伯來領錢，取出的一方舊章，正是公公早年刻的篆體，工整古雅，連振村都忍不住讚嘆，阿伯只是淡淡說：「這是你爸爸刻的啊！」語氣裡有種時間走過的平靜，許芷禎總覺得，那不僅是一枚印章，更像是一段被握在手心的往事。

後來，街上漸漸安靜了，電腦刻印變得普遍，一顆章只要幾十元，又快又便宜，手工刻印雖有種難以模仿的溫潤力道，卻終究敵不過效率與價錢的現實。許芷禎看得明白，時代的風向已經悄悄轉了。

「公路局停駛後，整條街就靜了下來」，她常這樣回想，客運不再進出，林班縮減，街上的人潮散了，印章的需求也如退潮般，漸漸稀少，他們慢慢不再接刻章的生意，店裡回歸到最尋常的雜貨買賣，日子彷彿也跟著慢了、淡了。

然而在許芷禎心裡，那些喧鬧的年歲並未走遠，她記得林班工人豪爽的笑

語、山裡居民樸實的问候、公路局職員匆匆的身影，還有振村在燈下一刀一刀刻下的時光，每一顆從這裡交付出去的印章，都像一個紅色的印記，輕輕蓋在這條老街曾經蓬勃的脈搏上，而她的雙眼，始終溫柔地守著這一切，從興盛到沈靜，如同守著一份不曾說盡的家族故事。

21. 陳志明



2019 年左右回到大武街定居，那時我們夫妻倆認真思考，回來要做什麼？最大的動機其實很簡單，們喜歡東部的慢步調生活，這裡是我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，更重要的是，山海近、自然環境好，空氣清新，讓人心安，一開始，我們想找與生態保育相關的工作，甚至考慮到池上的野灣野生動物醫院。但池上太遠，於是轉而思考，有沒有什麼事，能既貼近自然，又能在這片土地上養活自己？過程中，我們注意到許多長輩仍在採集野生蜂蜜，早期，部落採野蜂多是為了分享蜂巢與家人鄰居，但商業化後，大家為了賺錢，採集量越來越大，類似過度狩獵，對生態造成壓力。

我們於是問自己：有沒有辦法不破壞野生蜂巢，卻能品嚐到這片山林花朵的風味？蜂蜜的味道來自蜜蜂採集的花種—龍眼蜜、荔枝蜜皆如此，這片森林的花若能釀出獨特風味，我們何不自己養蜂，將山林之蜜轉為商品？於是，我們決定開始養蜂。

我們選擇的是西洋蜂（臺灣主流養蜂品種），但規模控制得很小，通常不超過 50 箱，因為西洋蜂非本土種，若箱數過多，會與原生東方蜜蜂及其他授粉昆蟲競爭花蜜，甚至影響植物分布與生態平衡，小時候，我在大武長大，福安宮廟口是孩子們的樂園，放學後、吃飯前，我們在那裡玩鬼抓人、捉迷藏，跑得滿身髒汗，被父母拎回家洗澡吃飯，飯後又跑出來繼續玩，直到夜深才被藤條、衣架甚至水管追打回家，那是最純粹的童年。

如今再回到大武街，廟口的孩子少了許多，人口外流、少子化是一因，電子娛樂讓孩子更少外出也是主因，晚上，廟口轉變成老人家喝茶聊天的場所，有人說這是落寞、雕零，但我覺得可以換個角度想。

大武本就是移民社會，原住民、日治時期漢人、大陳新住民，一波波人來人離，文化交融，我們這一代或新一代移民回來，不必執著於復刻過去的繁華，而是問自己，喜歡這塊土地的什麼？想做什麼？只要找到屬於當代的定位，就能成為新時代的大武人。

我相信，只要有人因為喜愛這裡的山海、慢活與自然而選擇留下或回來，這片土地就會展現新的面貌，我們用養蜂實踐了自己的選擇，也希望這份與山林共生的生活，能為大武增添一點不同的可能。

22. 陳宗欽



尚武村村長陳宗欽，今年 72 歲，我原籍嘉義梅山，八歲時隨父母遷居尚武，從此這裡成了我的家鄉。

初到尚武，印象最深的是漫天黃土的公路和茅草搭成的家，那時的尚武匯聚了各種族群，漢人、客家人、排灣族，還有一群特別的居民——大陳義胞。

民國 44 年，大陳島居民隨政府遷臺，約 150 戶落腳尚武，政府為他們修建小漁港（即大武漁港），並在鄉公所旁興建「披星新村」，然而漁港受東北季風飄沙所困，每年僅四五個月可出海，許多人為謀生不得不逐漸北遷，多落腳於新北中和、永和一帶。

但他們從未忘記尚武，每年媽祖誕辰，總有四、五輛遊覽車從北部回來，我們天後宮委員也會協助安排食宿，讓這份鄉情得以延續。

大陳鄉親還為尚武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產業，蝴蝶，當時生態豐饒，蝴蝶數量極多，他們向埔里盤商接洽收購，帶動全村捕捉蝴蝶的風潮，我記得父親總是一早帶著網具與竹筒，前往朝庸溪、安朔溪上遊，孩子們也趁假期捕蝶換零用錢，那時打零工一日所得買不到一鬥米，捕蝶卻能超過一鬥，因此成了許多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，那段被蝴蝶點亮的歲月，成為一代人共同的記憶。

如今，隨著行政單位漸次遷移，尚武似顯沈寂，但每當媽祖誕辰，遊覽車再度駛入，香火重新繚繞，我總會想起這片土地曾如何接納遠方的遷徙者，而

他們又如何以漁港、信仰與漫天蝶影，回贈了這座村莊一段生機盎然的過往。

23. 陳定榮



民國 44 年（1955 年）出生，那個年代，大鳥的生活環境極其落後，沒有排水溝，一下大雨，山洪就從上遊衝下來，部落經常泡在水中，政府剛從大陸遷台沒幾年，資源匱乏整個社會都艱困，但我們原住民有著強韌的適應力，部落仍能緩慢成長。

這一切，要感謝一位頭目—蓋亞馬（Gayama），他身材魁梧，心懷保護族人的強烈意願，對大鳥的發展貢獻極大，過去，我們分為幾個山上部落：採錢、出屯、達旺與和平，日本統治時期，原住民多居山區，各自為政，蓋亞馬卻有遠見，他與其他小頭目合作，整合各部落，帶領大家下山團結生活，也配合日本當局的教育政策，讓孩子們有機會一起上學，若沒有這樣的整合，我們今天恐怕不會有如此完整的部落聚落。

我讀小學一年級時，還住在達旺山上，每天由長輩陪同下山上學，六七歲的孩子獨自走山路太危險，怕遇野狗或其他意外，幸好有表姐和表兄弟三人結伴，直到三年級，我們全家才遷到現在的大鳥部落，那時部落一樣簡陋，沒有柏油路、沒有水泥、沒有排水系統，生活全靠山林與農地維生。

大鳥的地名來自一個古老傳說，據我父親轉述，從前一對夫妻夜晚回山上，用火把照明，途中飛來一隻巨鳥，撲滅火把，甚至將丈夫帶走，妻子驚恐逃回部落，從此這裡被稱為「大鳥」，另外，我們部落還有原住民語名稱「芭菜板」，意為「用籬笆圍起的家園」，早期沒有鐵絲網，大家用竹籬圍住住處，既

標示範圍，也保護安全，這便是名稱由來。

各支部落下山過程分階段，彩泉先到卡萬，再到伊比，最後抵達大鳥，初屯則經甲骨母、甲乳兩站，初屯離現在部落最近，下山最晚，大家生活主要靠地瓜、樹豆、花生度日，這些作物救了無數人，在最飢餓的時刻成為命脈，漁港雖近，卻常淤塞無法使用，土地貧瘠，又無平原種稻，農作物產量有限。

如今看來，大武最珍貴的資產就是自然與觀光潛力，若不好好發展觀光，大武永遠難追上鄰近鄉鎮，它們有溫泉、有特色農產，我們卻沒有可比之處，唯有把山海美景、部落文化轉化為觀光亮點，吸引遊客前來，把他們口袋裡的錢留下來，我們才有機會改善生活，這是最殷切的期望，讓大鳥不再只是傳說中的名字，而是充滿活力、讓年輕人願意留下來的家園。

24. 陳東茂



我記憶中的大武與尚武，曾是人聲鼎沸的地方。

早年尚武人口眾多，街上熙熙攘攘，日本時代沒有電，夏夜裡人們受不了屋內悶熱，便帶著草蓆睡在騎樓下、廣場邊，形成特殊的乘涼風景，那時產業以農業為主，滿山遍野種過香蕉、鳳梨，後來香茅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，帶動了地方發展。

尚武這條路，最初只是田間小徑，是我阿公那一輩用鋤頭一鏟一鏟從茅草中開墾出來的，這裡也曾被稱為「糖鋪」，因日治時期遍植甘蔗，設有製糖的場所，後來又有利用天然水源動力的草繩工廠，見證了早期的產業智慧。

在我家族記憶中，碾米廠是重要的一頁，大武老街短短三百公尺曾有三家碾米廠，其中陳家經營的「豐年碾米廠」原在大武，後因一場大火燒毀了整條街近半房舍，才遷至尚武，這位我們稱為「阿桑」的廠主，是地方上深受敬重的長輩，他曾運用發電機抽水，改善大武山區的灌溉問題，對農作貢獻很大。

我的阿公林鳳松與父親林玉成，在碾米廠旁開設腳踏車、摩托車修理店，父親常被「阿桑」喚去幫忙搬貨，那種鄰里間不分你我的互助，像家人一樣自然。整條街的孩子見了長輩，不是叫阿伯就是叔叔，那種親密感，讓大武老街成為我心中充滿溫度的所在。

後來，隨著加入 WTO，糧食銷售管道改變，本地碾米廠逐漸沒落，金龍湖

一帶曾由我父親打井灌溉，年產稻穀二十萬斤，如今也多已荒廢，父親曾在湖邊挖到質地極佳的黏土，感嘆若善加利用，或許能發展如鶯歌般的陶瓷產業。

這些故事，關於開墾、關於興衰、關於人與人之間樸實的牽絆，我總想著，如果年輕一代能帶著新的知識與視野回來，或許這片擁有山林、溪湖與深厚人情的地方，能重新找到屬於它的光亮，碾米廠的風華或許已逝，但那份土地與人之間的情感，依然在記憶裡，微微發燙。

25. 陳絹宜



民國 61 年（1972 年）出生於台東，但小時候常往返台東與大武，民國 60 年左右，父親來大武投資，買下我們家前面這塊地，大武第一個私人停車場，旁邊還有海豐旅社，買下後改名「輔都旅社」，一排十八間樓房，後面加蓋十一間平房，專供停車與住宿，那時大武街是高雄到台東的唯一交通要道，台汽站就在對面（原址今為大武分局交通隊，後遷至國中旁，1969 年興建，1998 年廢站），人車川流不息，堪稱「不夜城」。

小時候印象中，大武熱鬧得像永不眠的都市，晚上二十四小時生意興隆，攤販滿街賣香菇、金針、蘭花、靈芝，甚至野生猴子（當時無保育法規），林班工人、抓魚人、野機車拉客的旅客絡繹不絕，路顛簸狹窄，從台東到大武一兩個小時，大家必停：暈車吐、吃飯、上廁所，停車場天天滿車，生意火爆到用布袋裝現金！姐夫說，早十年更誇張，賣吃的攤販一袋袋嘎嘰作響的硬幣，銀行不方便，全靠現金交易，國中旁轉角出口，攤販雲集，麵店、小吃叫賣不絕。

我們家旅社生意極好，常請內講阿姨打掃房間，客人多是趕路工人、林班夫婦，從台北台中到台東，交通不便無法當天往返，就住一晚，隔壁旅社也爆滿，大武街兩三間、尚武幾間，光旅社就七八家，十八間一排，就擠三家賣菜、雜貨店、電器行（古姓伯伯家）、冰果室、藥房、診所（漢祥伯伯）、照相館、剪髮店、撞球場、遊藝場（打電動），對面茶藝館、卡拉 OK 熱鬧非凡，後

方斜對面大武戲院（與尚武東隆戲院、尚武戲院並列），五塊錢一張票，放二三輪片、愛國片、布袋戲，過年滿座！現在？八點街空蕩，只剩 7-11 與路燈亮著。

南迴鐵路 1991 年通車後，一切崩盤，台汽減班廢站，公路客運衰退，遊客銳減，大武無獨特觀光景點（如鄰鄉溫泉），無法留客，少子化、人口外流嚴重，年輕人不願抓魚、伐木（林班禁、森林保育），工作機會少，醫療教育落後城鄉差距大，以前什麼行業都有錢賺：林班、香茅、抓魚、賣山產；現在留不住人，村裡高齡化、空洞化，兒子們無法想像那人來人往的盛況，以前吃宵夜隨處有麵攤，現在得去便利店，若非自家有店面，我們也可能外發展，大武曾是中途大站，與楓港齊名黃金年代，如今需轉型觀光，活化舊台汽站（如 2025 年改車站公園，雖爭議但盼帶動），回首童年，那熱鬧不只經濟繁榮，更是人情味滿滿的記憶。希望大武能重生，讓年輕一代有理由留下。

26. 陳慶榮



我是陳慶榮，三歲那年隨家人從枋寮遷至大武，從此落地生根，我的母親是原住民，我來自和平部落，並曾擔任五屆部落主席。

「和平」這個名字有其淵源，日治時期，日本人在此設立一座名為「古修修」的農場學校，光復後，在一位通曉日語的吳正良先生倡議下，將部落命名為「和平」，沿用至今。

我記憶中的童年，充滿艱辛，我們住在自己搭建的茅草屋裡，木頭為柱，茅草為頂。每遇颱風，屋頂常被掀飛，半夜全身濕透，連棉被都能擰出水來，那時電力稀缺，一個月有二十天在黑暗中度過，父親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，民國五十年代，他前往王永慶公司開設的林班工作，在 37 至 42 林班間開闢道路。那時全憑人力，沒有挖土機，他常一去就是半個月，用一天一百多元的工資，勉強養活一家十口，我小學二年級時，曾因父親籌不出註冊費，延遲一個多月才上學，自此課業便跟不上了。

和平部落位處半山腰，早年大武國中、國小尚未設立，放眼望去多是梯田，日人修建的引水道灌溉著這片土地，而山上的族人則種植芋頭、小米，但收成有限，生活相當清苦，我們部落的族人，多是日治時期從新化遷移下來的，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便於管理，將原住民分散遷至平地，有些人落腳古莊，有些到大鳥，我們這支則來到和平，儘管行政劃分上隸屬大鳥村，但我們的生活圈與大武更緊密，文化傳承則與大鳥息息相關，我母系的親族網絡，更遠跨

至屏東牡丹、獅仔一帶，語言聲調也與東排灣有所不同，更顯柔和。

關於部落的名稱，還有一個古老的傳說，相傳從前有一隻巨鷹，時常抓走被安置在樹下的嬰孩，族人為了除害，利用牠的趨光性，夜間升火並在上方佈置帶刺的帳篷，終將其制伏，這個傳說，也為「大鳥」的地名增添了神祕的色彩。

回顧過往，我們從茅草屋起步，土地是公家的，沒有地籍，也沒有稅賦，哪裡能住便在哪裡安身，如今，雖然有原保地，但所有權仍屬政府，對族人而言，總有一種難以真正紮根的感覺，我擔任主席時，心中最大的期盼，是希望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能獲得正視，族人世居此地已數百年，那些他們曾經居住、耕作的土地，應當歸還給他們，這不僅是權利的賦予，更是對歷史與文化的尊重，讓我們有一個能安心稱之為家，並能世代傳承的所在。

27. 彭建銘



透過臺東 YouStart 創業計畫，來到大武鄉創業，那時，我和朋友想幫另一位專長養昆蟲的夥伴降低飼料成本，便在臺東四處找木屑來源，最後，我們在大武遇到大工農場的賴大哥，他種段木香菇多年，卻一直苦於廢棄木頭處理問題，工人嫌量大，不是丟進山谷就是焚燒，嚴重影響環境。

我們的需求正好與他的廢棄物對接，將種完香菇的廢木回收，製成昆蟲墓穴包（飼育基材），再加工販售到西部昆蟲市場，形成完美的碳循環，從農場砍伐、種菇，到我們回收、再利用、賣到外縣市，整個過程近似「以物易物」，既環保，又降低雙方成本，這也呼應臺灣當前的綠色議題，我們便決定用創業基金在大武深耕。

小時候，大武對我只是南下高雄的中途站，那年代南迴公路尚未拓寬，草埔隧道更未開通，從臺東開車到大武得花兩個小時，路又顛簸，媽媽常暈車嘔吐，我們總在 7-11 前停車場休息，吃午飯，當年停車場滿滿都是車，店家人山人海，熱鬧非凡，我們愛點炸鯖魚、山蘇、炒麵，海鮮新鮮又便宜，吃完繼續趕路到高雄，又得三小時，一天幾乎耗在路上，那是大武的黃金年代，必經之路的中繼站，無論中午或下午，總是擠滿歇腳的旅客。

如今南迴公路大幅改善，車程縮短，經過大武的人流確實增加，但真正停下來消費的遊客卻遠不如預期，店家看似變多，卻多是從老街外移，內部反而冷清，小時候逛老街，甚至買得到玉里的涼羹，代表當年經濟多興旺，如今，

卻少了那種「車一停、直接往裡走吃飯」的盛況。

創業三年，我發現大武最大的挑戰是人口外流與年輕勞動力缺乏，國中畢業後，有能力的學生多去臺東或屏東讀高中，大學生更難見到，段木香菇等傳統木頭產業逐漸雕零，我們想復興卻力有未逮，後來轉型，利用賴大哥農場的澳洲茶樹，三年間種下四千多棵，成功存活兩千多棵（大武紅土與明顯雨旱季，讓栽種不易），我們從茶樹提煉精油，開發清潔用品、化妝品等產品，並與社區發展協會聯名推廣，也 and 山豬窟協會合作蠟燭體驗課程，希望把化學專業轉為在地體驗活動，帶動小規模經濟。

雖然進展緩慢，但我仍相信，只要把廢棄物變資源、把專業變體驗，就能為大武注入新活力，期待未來有更多人停下腳步，不只路過，而是看見這片山海的潛力，一起留下來創造改變。

28. 黃月葉



我叫黃月葉，土生土長在大武，我的人生與這片山林緊密相連，從小跟著父親跑山，從認識藥草植物做起，後來專注蘭草與蕨類，如今我的園區已成為台灣原生植物的生態博物館，我也擔任大武的防災專員和鄰長，現在平常務農，也帶領生態導覽團，向人們介紹這裡的植物與山豬窟的自然景觀。

回顧大武的過去，人們多是靠海吃海，以抓魚苗為生；靠山則伐木，大武漁港是我記憶深刻的地方，小時候我們常去那里摸蚬仔兼洗褲，那時沒有正規港口，母親她們用竹排捕魚後，需要全村人幫忙拉上岸，然後大家分魚，做成魚松，直到蔣經國時期的十大建設，漁港才逐漸改建完成。

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是金龍湖，它原來叫大悲湖，因為地形似龍而改名，我們小時候常在湖邊玩耍，那里原本是一片稻田，後來休耕了，對我而言，大武變化最大的莫過於公路局車站，以前大武站是從枋寮到台東最大、最漂亮的車站，如今卻已消失無蹤，只剩下回憶。

這些變化背後，是嚴重的人口外流，早年大武人口眾多，如今戶籍雖仍有數萬人，但實際居住的很少，閩南人多已外遷，留下的大多是走不動的老人和幼童，我的家族很大，在大武街上有上千親戚，但年輕人幾乎都在外地，包括我的四個孩子，留在這裡，仿佛看不到發展的希望。

然而，大武最珍貴的或許不是繁華，而是它無可替代的自然生態，植物學

家稱這裡為寶窟，動物種類也極其豐富，你或許要去玉山才能看到的黃猴貂，在我們後山就可能遇見，山豬窟的可陀科植物，全世界獨一無二，連英國團隊都專程前來研究，黑熊甚至曾出現在住家附近，這都證明我們的生態環境依然純淨、完整。

我常對來訪的遊客說，你們來到這裡很幸福，因為能看見外面沒有的景色，呼吸到無可替代的空氣，儘管大武的繁華已隨時代遠去，但這片土地的生命力與美麗，依然在我每一次帶領人們走進山林時，靜靜綻放，這或許就是故鄉留給我，也留給未來，最寶貴的禮物。

29. 黃萬吉



現在要說的，是我們這邊獨一無二的「父母會」。

這件事是從爺爺那一代傳下來的，以前農業社會，大家日子苦，互相照顧是生存之道，有人提議組成「父母會」，每家繳一點會費，誰家有喪事，大家就出錢出力幫忙，這不是單純的互助，而是帶著嚴格規矩的團結組織。

父母會最特別的，就是「幫忙到底」的精神，有人過世，我們叫「會寄」（拜拜），全體成員都要到場，遲到、早退、坐桌子吃飯、洗手、綁白頭時笑、吃檳榔、甚至三更半夜也要出門，任何一點小違規，都會被罰，罰的東西早期是碗筷，後來碗筷太多，就改罰錢。罰款按照當時一天工錢算，兩三百塊，一罰就是心痛的損失，沒人敢講情，被「大哥尾弟」抓到，直接挖你嘴巴，看有沒有檳榔、笑沒笑，全場沒第二句話，「大哥尾弟」是會裡的領頭大哥和尾弟，負責管全部人，而「會子」就是往生者的兒子，大家又反過來管這兩個頭頭，互相牽制，誰都跑不掉，會裡有人生兒子叫「出丁」，每年要擲爐主（頭家），爐主得先做出「新燈菇」（紅龜粿），一人兩塊，分給全會成員，最多的時候，我母親生五個，我們一次做五盤，夠大家分。

最辛苦的是「棒花」——幫忙擡棺、扛砂石、堆土，全靠人力，扛再高、再重也不能喊累，扛完還要「攔尾會」，殺豬宰羊慶功，整個過程像軍隊一樣嚴格，卻也讓大家團結得像一家人，這個父母會跟一般標會一樣，最後一個死的叫「尾會」，就像標會最後標中的人，會可以繼承、買賣，加入新會員要繳高額

費用，很多人想進卻進不去。我父親那代就加入，一直做到我七十幾歲，四五年前才真正結束，最後一個人走了，沒人再招，連禮金都沒人要收，就這樣圓滿畫下句點。

這父母會持續幾百年，只在我們這一小塊地方有，別處從沒聽過，為什麼能維持這麼久？因為大家都守規矩、沒人放棄。農業社會的苦日子，靠的就是這種「你幫我、我幫你」的互助精神，社會發達後，生活好了，互助需求沒那麼迫切，父母會自然走入歷史。

如今回想起來，那嚴格的罰則、深夜出門的命令、綁白頭不能笑的規矩，聽起來像束縛，但它其實是哪個年代最溫暖的團結，沒了父母會，我們這一代少了很多「伸把手」的機會，也少了很多「被大家盯著」的責任感，時代變了，舊規矩走了，但那份互相扶持的精神，還是值得我們記一輩子。

30. 葉少雲



我是葉少雲，出生在大武的「外省第二代」——父親來自江西廣豐，母親是本地拉勒布羅曼部落的獵人公主，我常說自己是「白灣加吉里的仿仔雞」，熟悉台語、國語，也能說一點母語。

十幾年前，我在台中讀書、結婚，先生過世後，我毅然返鄉，十四歲離家，一直渴望回來為故鄉付出，如今，我擔任山豬窟休閒農業區理事長，希望將過去在外所學，回饋給這片養育我的土地。

我的母親來自拉勒布羅曼部落，意為「浸泡之地」，我們是獵人後代，沒有頭目制度，祖靈不在屋內，而在自然之中，傳統上，我們會在茄苳樹下存放獵物，樹根下的冷泉如同天然冰箱，讓肉品不易腐壞，部落周圍要種姑婆芋與大樹，生命與信仰，就這樣與山林緊密相連。

這片土地的歷史很深，朝庸溪上遊曾發生「南蕃事件」，日治時期為收繳槍械，引發部落反抗，那裡曾是沈默的戰場，而舊台九線上的「五虎溝」，水源豐沛，相傳開鑿時曾挖到「龍脈」，水流不止，最後由頭目召集各部落祈福，以傳統儀式平息，這些故事，如今已很少人提起。

我們部落源自新化(古發楞:Kufalen |排灣族語)，經過古仔崙社、巴塑衛林線，一路遷徙至現在的拉勒布羅曼，這段遷徙記憶，若無人述說，恐怕就會隨風消散。

我回來，不僅是為了生活，更是為了記憶，作為獵人後代，我深知土地的故事需要被聽見，祖先的足跡需要被記住，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，讓更多人認識山豬窟的自然與歷史，也讓下一代知道：我們從何而來，又該往哪裡去，這條回家的路，也是重新紮根的路，只有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才能走得更遠、更穩。

31. 董炎輝



董炎輝，今年 77 歲，在大武出生，父親也是。我的祖先從恆春遷徙而來，在這片土地上開墾生根。

小時候的大武人口不少，但生活艱苦，大多人務農或做工，種稻常遇病蟲害，沒錢買農藥，灌溉得打井，費用高昂，往往入不敷出，那時也有不少人靠海生活，用漁排出海圍捕魚苗，魚獲多到每天都能吃魚。

早年交通不便，只有公路局巴士，車班密集，一天上百班次，帶動了大武的短暫繁榮，街上旅社、戲院、茶室、飯店林立，人車喧嚷，非常熱鬧，林班工作也吸引很多人，王永慶的「中台公司」和其他私人企業在此開採山林，提供了不少工作機會。

大武曾有幾間碾米廠，最早是張阿替經營的，他還兼營發電，讓夜晚的大武有了光，後來楊家、尚武陳東茂家族也陸續開設，但隨著家家戶戶自購碾米機，碾米廠生意漸淡，最終一一收歇。

改變的轉捩點是南迴鐵路通車，火車通了，公路局就沒落了，巴士班次大減，人潮也隨之散去，加上外環道開通，發展重心逐漸轉移，大武街日益冷清。

我見證過這裡的信仰活動，廟會時神明遶境，連日熱鬧，也記得颱風來襲前，氣象站懸掛風球警示，人們忙著加固土墘厝或茅草屋的歲月。

如今大武人口外流嚴重，年輕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外出謀生，街頭安靜了，昔日的繁華只剩下回憶。

我常想，大武要再發展，可能需要引進沒有污染的工廠，或找回過去的部隊駐守，帶來人氣與消費，但我們這一代已老了，新的思維與機會，終究要交給年輕人，只盼望這片故土，能在未來某天，重新找回屬於它的生機與溫度。

32. 廖紹安



廖紹安，本是屏東潮州人，民國 101 年（2012 年）來到臺東，起初，我和大武的緣分很淺，只是因為認識現在的太太，才開始有些互動，否則就像大多數人一樣，路過吃海鮮，便趕往下一個行程，直到 111 年（2022 年）我回來參選農會代表，走訪每個角落，才真正深入認識這片土地的人文與自然資源。

選舉期間，我走遍尚武、大武，才發現這裡藏著豐富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寶藏，這塊土地曾是荒地，我岳父每年花兩三萬元除草，如今卻因年輕人回鄉而煥發新生，隔壁即將開設陶藝工坊，許多返鄉青年正努力把地方產業帶起來，也為自己找到生機，我看見大陳義胞聚落逐漸雕零後，新一代年輕人正帶來改變，為大武、尚武注入新的生存契機。

大武的地理位置優越，自古便是南迴中繼站與門戶，近年「大武之心」南迴驛站的設立，更強化了這份角色，但要讓旅客長宿，仍有挑戰，延伸景點相對不足，我認為機會在於與阿朗壹古道結合，發展在地體驗行程，將單日遊升級為兩天一夜，未來若能與達仁鄉合作，把單點景點串成線，甚至擴大成面，將更具吸引力。

年輕人回鄉不易，產業投入又有風險，如何透過政府資源挹注、輔導機制，陪伴他們成長，是公部門應有的思維，我也常思考，如何引進外部資源，讓原住民與平地青年都願意參與產業，在一級生產端，我看好洛神與小米，價格穩定、漲幅可觀，且能避開火害，洛神更可乾燥加工，提升保存與價值，縣

農會已有保價收購，若需要農改場評估或建立機制，我很樂意協助推動。

回鄉的年輕人，像鮭魚返鄉般珍貴，他們得重新調整收入與生活型態，比當年大陳義胞更不容易，如何讓他們務農、做生意都能存活，是關鍵，我願意分享資源資訊、交流經驗，帮助大家適應、解決問題。傍晚我常繞村一圈，看到的總是長輩與孩童，少見青壯年，這是偏鄉最大悲哀。若能發展讓年輕人留下的產業，讓村子充滿活力、友善平安，歡迎外地朋友停留，我相信尚武大武會更好。

我們村範圍廣闊，除了本部落，還有辟興新村（原大陳義胞聚落）、古庄、泰武、西市武等部落，以及金龍湖、山豬窟休閒農業區，這些自然與人文景點，都值得都市朋友來走走、停下來，感受這片土地的溫度與潛力。

33. 趙世崇



18歲高中畢業後，跟著經營卡車的父親來到大武，一住就超過五十年，人們說「大武土黏黏」，來了就走不了，我深有同感。

初來時，租的草屋連浴室、廁所、廚房都沒有，九降風一吹，日子像天天颱風。但那時的大武，卻充滿生氣，民國58年，人口約有一萬二到一萬七千人，街上熱鬧非凡，我住在過溪一帶，每天走到廟口吃一碗五塊錢的飯配油豆腐，就是生活。

當時大武橋北邊有「十八間」聚落，是熱鬧的起點，後來我當兵回來，從事修車，也把家安在過溪，父親買下溪邊低窪的土地，那時沒有怪手，就用六台鐵牛車，靠人力一鏟一鏟從溪底載土石，足足填了三個月，才墊出我們如今居住的家園與對面的停車場。

大武最繁華的歲月，是公路局車站還在此地的時候，旅社、茶室林立，人潮絡繹不絕，後來我們兄弟看準遊覽車商機，從賣香菇、金針、木耳的山產店做起，生意極好，小小一店日營業額可達十萬，但我也是大武沒落的「罪魁禍首」，我帶著兄弟把生意擴展到南興的圓山休息站，漸漸把遊覽車人潮引了過去，街上的熱鬧便一點一點散了。

如今大武人口只剩五千多，像座養老院，年輕人留下多為照顧長輩，難有發展，我常想大武的老街若能像鹿港那樣整建起來，集中一些小吃、小賣，讓

遊覽車願意停駐，讓人走走看看，或許能為地方帶來一些生機，不圖賺大錢，哪怕一天一千，一個月三萬，也能讓年輕人邊顧家邊掙生活，減輕些負擔。

從萬人潮湧到安靜日常，我見證了大武的起落，也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與遺憾。這片土地黏住了我的人，而我的選擇，也無形中改變了它的風景。

34. 劉明木



從小在大武以海為生，那年代，我們出海全靠竹排，用扛的、推的，把竹排推入海中，捕魚回來再扛上沙灘，漁獲多是白帶魚或虱目魚苗，魚苗季節在清明後到七八月，其餘時間海風大、難捕魚，就得上岸找零工，或到外地做工程，整理竹排、修漁網，等下個魚苗季再回來，一年到頭圍著海轉，據長輩說，大武漁港是老蔣帶來大陳義胞時興建的，原本讓大家有了依靠的地方，可惜港口易積沙、常阻塞，一度幾乎廢棄，後來整修通了，竹排、漁船才真正進港，大家生活才穩定些，那時魚資源豐富，抓多少賣多少，剛好夠當天客人。

大武街最熱鬧的時候，是因為它是南迴公路必經的中繼站，台汽站就在街裡，大卡車、客運車 24 小時川流不息，往台東、屏東、高雄的司機和乘客都會停下來吃飯，街上有好幾家「飯店」（我們那時叫餐廳為飯店），煮魚湯、海鮮麵，半夜都有人吃。麵店、海產店一家接一家，後來又開始賣金針、香菇、山產，過路客順手買走，生意興隆。

漁民賣魚也是現買現賣。今天捕多少，就賣多少給飯店，夠他們當天用量就好，明天再說，公路車跑得勤，客人多，自然帶動整條街，福安宮廟口更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，大家玩鬧到深夜，後來台汽站遷到過溪另一邊，外環道又開通，車流繞過老街，大武街瞬間冷清，海產店、麵店逐漸收攤，賣山產的也少人問津，南迴鐵路通車後，客運更慘，一台車常常只坐一兩個乘客，成本都不夠，乾脆停駛。大家改搭火車，公路時代徹底結束，老街就這麼沒落了。

年輕人越來越少，以前廟口熱鬧，現在除土地公千秋才有人回來聚聚，其餘時間，安靜得只剩老人和孩子，很多人外出去工廠打工，賺錢養家，村裡空了。

以前醫療不便，鄉下看病得坐車一兩個小時，還不一定有錢醫，我們習慣先問神、請示土地公或神明，病好了就不用跑大醫院，醫不好再去，拖得過就活，拖不過也沒辦法，那時對神佛很虔誠，因為醫院太遠、太貴。

現在家家有車，醫療進步，生病直接開車去醫院，治不好才會想到問神，順序反過來了，先相信醫生，後求神佛，大家經濟好轉，對神明的依賴自然淡了，回想那段日子，雖然苦，卻簡單踏實，扛竹排、推漁船、賣魚湯、等公路車，一切都圍著海與路轉，如今港口仍在，老街卻安靜許多，只希望大武的下一代，能在這片海邊找到新的生活方式，讓家鄉再熱鬧起來。

35. 劉貴雀



我小時候住在大武，就讀大武國小，那時的大武老街非常熱鬧，人來人往，有台汽客運必經此地，街上商店林立，旅社、餐廳、修錶店、冰果室，一應俱全，誰家的手錶或時鐘壞了，都拿去修，沒什麼零食可吃的年代，鄰居阿媽會從整甕黑糖裡挖一塊給我們當零嘴，那甜味至今難忘。

大武靠海，男孩子的童年離不開太平洋，為了抓魚苗、討生活，他們從小就得學游泳，不是在游泳池，而是在海浪間搏鬥。女孩子若去海邊，卻常被母親責罵，因為曾有孩子被海浪捲走，令人提心吊膽，大武溪也曾是魚苗豐盛之地，而大武漁港早年靠竹排搶灘上岸，遇上大浪，常險象環生，家人無不憂心。

家中曾經營碾米廠，由我公公一手創辦，那時政府配給公糧，公務員憑糧票來領米，米以「鬥」計，一鬥 23 斤（約 13.8 公斤），幾天就吃光了，家家戶戶孩子多，米銷量大，如今只剩老人留守，小包裝米吃上幾個月，碾米廠自然難以維持，後來便收了。

我嫁到大武是民國 72 年（1983 年），那時南迴鐵路正在興建，工人眾多，我曾開過雜貨店，生意一度還不錯，但隨著人潮退去，大武逐漸冷清，如今整條街晚上八點便空無一人，外地人也不願久留，這裡沒有觀光亮點，年輕人覺得無聊，連我自己的孫子，小時候愛回鄉玩山玩水，長大後卻再也不想回來。

過去的稻田如今荒蕪，金龍湖畔曾是一片綠油油的秧苗，過年時，別人出遊，我們初二就得上山插秧，颱風來襲時，稻子泡在水裡，農人仍冒雨搶收，甚至借用大武國小的操場和教室曬穀，那時曬稻子，皮膚癢得難受，卻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如今我在自家門口賣鹹酥雞，不為賺大錢，只圖老人有事可做，有屋可遮，無需付租金，大武或許不再繁華，但這片土地承載的記憶，卻永遠鮮活，那是我們用汗水、海浪與黑糖味築起的家。

36. 蘇振村



六歲那年，我跟隨父親來到大武，父親以刻印章為生，那時街上只有我們一家刻印店，一做就是二、三十年，後來，過溪(在地地名稱呼)和大武才陸續開了其他店鋪。

我們最早租住在對面，後來買地蓋了房子，二十幾歲起，我便跟著父親學習，除了刻印，也開始接觸山產生意，收購穿山甲、白面鮑、蛇等，其實刻印手藝多是叔叔教我的，他曾專程到台南學藝，退伍後便協助父親，而「盛文堂」是我父親創立的，來刻印章排隊等刻印章的盛景，以及當時老街人山人海的樣貌，現在都已經成為我記憶中的那繁華的大武老街。

早年，刻印章是門好生意，政府機關、生意人，甚至一般百姓需要開戶領錢，都得用到印章，那時錢幣價值高，刻一個印章五十元，客人仍絡繹不絕，常需排隊，盛文堂的老闆最初就在我家騎樓下擺攤，後來才租屋、買地，開了雜貨店兼營刻印。

真正的手刻印章，每個字體、筆畫都獨一無二，尤其是篆字，刻來格外講究美感，我曾見過一位長輩的印章，篆體工整漂亮，一問之下，正是出自盛文堂老師傅之手，如今電腦刻印普及，字體千篇一律，手工刻印的那份獨特與溫潤，便漸漸被遺忘了。

大武的繁榮，與公路局車站、林班工人的聚集息息相關，那時旅社、戲

院、雜貨店林立，街上人來人往，刻印店生意也因此興旺，工人領薪需要印章，旅客忘帶印章也得臨時刻一顆，父親的店兼賣雨衣、雜貨，成了公路局車站旁熱鬧的一角。